



编者按:

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七九级二班,这个被教育部评为“先进班级”的集体共有50名同学。四年大学生活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感。在那个没有电脑、手机的年代,这些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上课、运动。如今,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颇有建树,或是大学教授,或是警官、检察官。弹指一挥间,经过三十年的悲欢离合,再聚首时,依然相见如初。就像大家说的:七九二是永远的大家庭!

七九二精神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顾德镛

西北政法学院(现改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七九级二班,是一个令人十分怀念的集体。共同学习生活的四年,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每相聚,大家总有无尽的话题。

是什么东西令人难以忘怀?有人说是一种精神。那是一种什么精神?以我之见,如果用最简洁的词汇来归纳总结,就是四个字:团结,向上。

团结
说到团结,必须首先回顾一下这个班学生的构成。恢复高考,七九级是第三届,也是西北政法学院恢复招生的第一届。1979年9月中旬报到,全班50个同学,年龄上下相差12岁,来自西北五省不同地区。进校时20岁以上只占二分之一,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享受助学金的占三分之一,直接从农村考来的占四分之一。

就是这样一个个颇具多样性的集体,年龄大的自然成为班委会的基本构成(也被诟病为老人政治)。大同学在生活中关心小同学,率先垂范;小同学则在公益活动中一马当先,吃苦耐劳。

1980年春天,学校开展学雷锋活动,班上组织到公交车站帮助清洗车辆,为此学校奖励了30元现金。怎样使用这笔“巨额”班费,也动了一番脑筋。最终决定租一辆

卡车,放上座椅,同学们去乾陵旅游一天,令其他班羡慕不已。

1981年秋天,学校传染痢疾,来势凶猛。许多同学不幸被传染,或宿舍、或学校医院、或传染病医院,打针吃药。有一天上语文课,全班只有四、五个人在教室。语文老师误以为学生们故意不来听课,甚为恼火,严厉批评。当他知道同学们都在医院的情况后,遂停止上课,去宿舍、去医院看望学生。

每年确定享受困难助学金的同学名单及等级是各班颇为伤神的事,因为名额有限。而在七九级二班,你推我让,处理起来并不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众多农民解决了吃粮问题,但仍然手中无钱。即使农村来的同学被评为一等助学金,扣去伙食费,也不过四元钱。贾宇年龄小,进校后个子长得快,裤子成了高吊,四元钱是没法买到一条裤子的,他请傅红同学帮忙接长裤子。傅红四处寻找质地、颜色接近的布料,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向上
团结是向上的基础,一盘散沙很难产生向上的精神。向上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方显出他的集体主义的精神风貌。

学校每年都举行运动会,球赛、田径、体操等等都分别排名,然后累加成各班的总分。七九级二班历经三届运动会,总分始终第一。在项目报名时,班上同学都积极踊跃,各尽所长。大家那

青春都在西北政法 七九二的故事

种为了集体的拼命精神,常常令人感动。有一次踢球,李建华同学奔跑抢球时不知被谁踢了一脚,右脚脚掌顿时朝后了。大家急忙请校医打了杜冷丁,又抬到红会医院复位打石膏,半年后李建华才行走自如。

学生以学为主。为了大家能考出好成绩,班上也是绞尽脑汁。四年中,三十多门主课,十多门选修课,班上都安排一名同学当课代表,负责收作业、联系任课老师等等。四年中,基本上每个人都当过一门课的代表。而七九级二班每门课基本上都是同年级五个班中平均分最高的,于是三次被评为三好班集体。1982年被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评为全国三好班集体,奖励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现存于校史馆。

小结
团结向上的精神,不仅造就了一个集体,也熏陶了其中的每一名成员。1983年8月毕业,大家各奔东西。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在世的48名同学,其中律师10人(不含兼职)、警官、检察院、法官、司法行政官员13人,大学教授18人,其他党政机关、自谋职业或经济组织7人。以上人员中,副省级2人,厅级9人。西北政法大学的校长班子中,七九级二班有两位。永远的七九二。



七九级学生干部顾德镛

我的小组长

贺文学同学(毕业后改为贺嘉)比我大一岁,与我同宿舍四年,是我们组的组长,也是我们宿舍的舍长。他是一位内向、文气的人。他的床头有一个小台灯,晚上总是躺在床上读书到很晚。我的小组长很喜欢古典文字,不论是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还是古代的典章制度,他都喜欢研读,并喜欢写一些诗词之类的文字。受他的影响,我也经常模仿着写一些文字。

他也是一个专注的人,对古典文学专注,对专业专注,对爱情也专注。他是我们班谈恋爱较早的人之一,他女朋友在渭南读师范,有共同的文学爱好。每次她来,他们就会专心地进入二人世界,我们同宿舍的也知趣地回避。

后来他顺利地留校当老师,考取了研究生,后来又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全家也由西安迁至北京。就在人生、事业、家庭都进入黄金的平稳期时,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我和在京的同学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最后见到的只是他的一个骨灰盒。写下此段文字时,他拿着我的诗稿专注地审阅的神情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并永远定格在我内心深处。

行文至此将要收笔,但还有我们班许许多多的同学需要描述,还有许多画面需要勾勒:为我们班排忧解难而全班在比赛场地上呐喊助威;为同学们尽心服务的老班长顾德镛,曾和我一起雨夜在教室里办板报的付红和江合宁,和我曾是上下铺的马建川,在床头放着饼干盒边吃边看书的钟卫卫(毕业后改名),在宿舍夜话时,对国家领导人名字记得特别清楚的韩永明(毕业后改为韩松),直言快语的梁增昌,热衷于国家关系与政治的张江河,在操场边的小树下读着英语的周健,能送来温暖家书的“大个子”,我们班的歌唱家李茂荣、李娟……

永远的“七九二”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研究员 冯建仓

到了一小半;从职业来看虽然也有些应届的,但不少已有工作的经历;当然还有来自农村与城镇的区别等等。这中间有过纷争,还有过为谁进班委而拉选票并且多次进行全班选举的事情。但有一点是很突出的,除积极学习外,就是浓郁的政治方面的上进气氛,主要的就是积极入党。这也是我们班能成为全国先进班的基础。

我们班本身就有几名党员同学,后来又陆续地分批次有多位同学入党。杨玉梅同学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争取上进的同学都在积极表现,要让班上同学,尤其是党员同学和主管我们的老师们知晓。

吃的问题
入学那年刚刚改革开放,食堂伙食还较差,每天早上咸菜萝卜条、玉米面与白面的二色花卷和汤老三样,正餐菜样也很少。直到第二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食堂也进行了承包,花样也慢慢多起来。

为了加强伙食管理与监督,每个班还选出了伙食管理员,我们宿舍的长跑健将桂博同学(现在在美国)就担任此职。随着进入大学高年级,我们的食堂伙食从花样到质量越来越好。记得当时红烧排骨二毛五分一份,米粉肉三毛一份。有一道菜是食堂的“明星”菜,几乎每天在食堂的水牌中都有,就是“蚂蚁上树”,这道菜既好吃也好做,价格也不贵,就是粉条和肉末炒在一起,用酱油上色,顾名思义而起的一个名称。



“西北政法学院七九级二班”这几个熟悉的字,不仅是我大学四年中来往信件封皮上必写的,而且是几十年常伴我的心灵深处一个专有名词。不管岁月流逝多久,每当提到这个名称,我与亲爱的同班同学总有一种心灵上的感应。

浓郁的政治气氛
我们班五十名同学,可谓成员复杂:从年龄看相差12岁,最大的出生于1952年,最小的出生于1963年;从地区看:虽然来自西北五省,但来自陕西的同学就占

记忆中的七九二

武警政治学院教授 周健



七九二被评为全国三好班级

要找韩松很好找,他不在总编办公室,就在去总编办公室的路上。韩松当了很长时间《法律科学》的总编,这个刊物一直名列法学类杂志前茅。

韩松是陕西凤翔人。毕业很多年后,我去他的家乡,他家旁边是西凤酒厂,站在田头,仿佛能闻到酒的香味,但可惜韩松从来不爱喝酒。他对我说凤翔有三宝:西凤酒、东湖柳、姑娘手,而且专门陪我去凤翔东湖公园看了苏东坡栽种的满园绿柳。“姑娘手”,说的是姑娘的手巧、剪纸、刺绣、草编样样都精。

韩松喜爱秦腔,碑林区法院附近有著名的秦腔百年剧社“易俗社”,还有“三意社”、“尚友社”等,晚上住在法院时,他常去附近的东木头市朝阳剧场、西一路的易俗社、骡马市的工农剧场看戏,我也曾陪他看过。

在1983年春天四年级实习阶段,七九二在西安市的区基层法院和区检察院实习,我和韩松被安排到碑林区法院实习。为方便乘车,给每个同学都办了月票,但韩松晕车,在班干部和老师的关照下,在碑林区法院给他安排了住处,避免每天往返的痛苦。但在法院办案,总要调查,还是要出外的,我就从家里给他弄来一辆旧自行车。这辆自行车虽然旧,但很好用,他骑着自行车,走南闯北,很是方便。韩松后来说道:多少年过去了,我总是感到周健的这辆自行车是我骑过的最好的自行车,简直就是我的“奔驰”、“宝马”。

韩松上学时叫韩永明,毕业后改名为韩松,这个名字像个学者。毕业后分配到宝鸡市司法局。1984年的

秋天,我去宝鸡看望他,我俩徘徊在宝鸡的大街上,也许是他对校园生活的怀念,他突然要我唱首歌给他听,我就用粗哑的嗓子唱了几首当时很流行的校园歌曲《童年》、《乡间的小道》等等。

在宝鸡司法局工作五年之后,韩松考上了西北政法大学的民法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学报编辑部从事《法律科学》的编辑工作,并任教民法教研室。他做学问认真,长期坚持研究“农民集体所有权和土地问题”,现在是陕西省民法学研究会会长,是西北政法大学少数的几个二级教授之一。2008年,在中国第二届法学优秀成果奖评奖中,韩松的一篇论文《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法律问题研究》获论文类最高奖,我的《周健军事法文集1-4》也获专著类奖。

韩松年轻时晕车,后来出行撞了一次车,竟神奇地再也不晕车了。我在西安时,有空即拉上韩松一起出游,去过王顺山,上过白鹿原。长安县的广场旁有一家“梅花弄堂”地道的风味餐厅,吃着羊肉泡馍,听韩松哼着纯正的秦腔,这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因为我们是七九二班的。

2006年9月,我们班在北京工作的贺嘉同学逝世,我和韩松连夜坐火车赶往北京八宝山公墓参加贺嘉同学的追悼会。凌晨,我们一下火车直奔八宝山公墓,时间尚早,我们就静悄悄地坐在革命公墓的石椅上,松柏青青,晨风中追忆同学贺嘉的点点滴滴。我们的话题从同学间谈到了人生。对人而言,死,本就是生的一部分,生死不过是一个事情的两面而已。生死一念,出生入死,向死而生,最终,归结指向“爱”,爱,是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

流传的乔布斯的遗言说:“我生前赢得的所有财富都无法带走,能带走的只有记忆中沉淀下来的纯真的感动以及和物质无关的爱和情感,它们无法否认也不会自己消失,它们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其实,人生云水一梦,而我们就是那个寻梦的人。在千年的河上漂流,看过流水落花的风景。时间,这样过去了。七九二就是一个大家庭,贺嘉对我们情同兄长,我和韩松代表陕西七九二的同学赴京送他最后一程,表达我们的哀思。

我的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本科毕业30年回望

广东晨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崔峰

城市到乡下来的“下乡知青”。

1977年的一天,正在田里浇地的我听到了收音机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命运重又想我打开了一扇大门,在家人的支持下,我重回学校复习。1979年高考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入学后,得知自己被分到2班,班里大约有一半同学都比我年长。班长顾德镛、团干部杨玉梅等多人有五年以上工龄,享受带工资上大学的生活待遇。我和其他一些同学根据家庭收入享受不同等级的国家助学金。

我们上大学的这几年,“文革”刚结束不久,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学们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大学的机会。早晨的操场上总能看到见贾宇、李茂荣、张江河、崔皋平等一大批同学朝气蓬勃的身影。我们班德、智、体各项考核指标均为优秀,曾被评为“先进班级”,受到国家教育部的表彰。据说当年陕西30多所高校中,受教育部表彰的班级只有两个。

毕业时被分配留校在民法教研室任教。第二年初,我考取了刘振江教授的国际私法专业研究生。刘老师50年代初留学苏联,获得莫斯科大学法学副博士学位,是母校老师中仅有的一位“海归”。在研究生阶段,我进一步开阔了视野,而且提高了论文写作能力。这些诸多进步,使我走上法学研究之路。

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在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任教。1992年底,追随“小平南巡”的脚步,我在珠海经济特区“下海”做了律师,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留在沿海从事律师职业的法律工作者之一。

光阴似箭,岁月荏苒。我从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成为有一定业绩的律师。我为自己取得进步而欣慰。尽管已有白发,但光阴没有虚度。

由衷地感谢这个中华复兴的时代给我提供了学习与工作的机会和环境;感谢母校老师们的精心培育;感谢同学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般的关心和帮助。

毕业整整三十个春秋了。但无论身在何方,常梦回西安,梦回母校,梦见到那些共同峥嵘过的同学!

我的七九二姐妹们

新疆警察学院院长 李娟

看着在我所在的学校中法学专业女生的绝对比例,我就感到很疑惑:不知是因为当年的人口比例问题,还是我们上学时女孩子普遍学习不好,在复校首批招收的法学专业近250名女生中,女生只有35名。但说起我们七九级法律二班,仅有的7名女生却是不可忽视的。那份积极、朴实、真诚、率直却也同七九·二的班风和诣地融为一体。不知是七九·二锻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成就了七九·二的风格。

不知从何时起,“马老师”就成了我们对马晓玲同学一致的称谓。一开始似乎是因为她过去当过老师,可能还由于她是班里七名女生中“大姐大”吧。我眼中的马老师,表面宽容而随和,实际上却较真而倔强,老成稳重的外表下,童心闪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她与我相反,是全班女生中毕业后“动”得最多的一员,既包括长距离的调动工作,也包括自由的约伴旅游,令人羡慕不已。

杨玉梅,班里女生中年龄上的老二,洒脱而干练,勤于思考而能说会道,是名副其实的班干部。就她人生经历来说,应该是我们女生中最丰富的。她所表现出的成熟、大方和与众不同的哲学思维,深深吸引了从未走入过社会的我。在我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刻,大姐杨玉梅给了我很多的开导,也让我有了一个敢于敞开心扉、暴露思想,并从她那里受到启发、帮助和指导的知己。

江合宁,女生中年龄上的老三,大家心理上的大姐。宽厚、温和、外柔而内刚,热心而顽强,富有生活的情趣和朝气,不乏令人喜爱的童真。在宿舍里的六张床上,她的床是被人坐得最多的,尤其是我。不仅是因为那个位置,而是因为那份温暖。应该说:虽然她从不以大家的“知心姐姐”自居,但每一个人都明白,无论你有多么私密、羞涩的小秘密告诉她,你都会得到充满善意、设身处地思考后的意见和建议。

周宁,班里女生总的“中流”砥柱。认真、善良、温柔、慵懒的特征,使她一想起她,就联想到一只雍容华贵的波斯猫。刚进校时因为女生少,所以绝大部分都进了各种运动队,周宁被选进篮球队。跑步、传球中,那个大个子身体的柔软会令你不可思议。多年以后闺蜜们一起议论说:女人什么地方最性感?结论是——手。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周宁那只细长、白皙、柔软无骨、性感无比的手,和手上正在啃的一只猪蹄。那就是她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形象吧。

付红,出生于1960年的她已经被列入我们“小帮子”的行列了。大学里的付红话不多,总是露着温柔的、甜甜的微笑。学习起来的认真劲,少有人能比。虽然作为西北政法学院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批学生,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能力和进取心都不弱。但都赶不上付红那样玩命。四年来,她是最女生中最沉默的一个,但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她会通过敲门或者脸盆来表示。令人意外的是,不善交际的她却是全班女生中唯一一个与邻班男同学牵手的人。

董承红,四年大学生活中联络最多的小伙伴。我们有着那么不同的生长环境、外形、处事风格,但四年大学生活却给了我们那么多相同的机会。她的身上体现的是最典型的南方女性特点,我则浑身散发着北方女性的豪情。较好的容颜、玲珑的体形、热情活泼的性格等等,这一切使她成为了众多男生心中追逐的目标,尽管没有人敢直接表达。

我,热情、豪爽、坦率、正直、大方、敏锐、侠义、乐观……所有用在男性或女性身上的公共褒义词,大家都不吝地送给了我,我自豪、我骄傲、我正洋洋得意的享受中……却突然发现我已走在快步走向人生的终点,而我的心、我的情感、我的记忆却还在七九·二的四年中。



西北政法学院七九级二班



法律系七九级二班学习研讨会